

“双防”担纲明年宏观调控主线

热 点 评 说

节能减排“包袱”怎样变财富

► 百合

近日,节能减排相关政策出台可谓紧锣密鼓:国务院批准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及考核实施方案和办法,节能不达标,将对领导干部实行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减排不过关,将暂停该地区所有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放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接着财政部表示,今年中央财政投入 235 亿元支持节能减排,同时促进节能减排的税收政策正在抓紧制定中。

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并用,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并重,政策“组合拳”的力度前所未有的。有人将之形象地称为“胡萝卜加大棒”:节能减排搞不好后果很严重,领导干部没退路,经济发展没出路;节能减排搞好了“甜头”一大堆:财政奖励,贷款优先,税收优惠,经济发展的后劲会更足。

平心而论,一些地方对节能减排并非不重视,各种措施、规定也出台不少,但效果并不明显。究其原因,一位主抓工业的地方领导倒出了苦衷:节能减排不是喊口号,得真金白银地投入。节能,要对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减排,要对污染进行综合治理,哪一样缺了钱都不行,而淘汰落后产能,地方还会减少税收。这种只有投入、没有收入的事情,无论是对方政府还是企业来说,都是个沉重的“包袱”。

的确,节能减排如果只是以一谓被动治理,肯定会增加政府和企业的负担。但如果换一种角度和思路,节能减排就不但不是“包袱”,还可能成为财富。在内蒙古亿利能源化工循环经济产业基地,几大生产项目环环相扣形成了一体化循环产业链:发电厂“吃掉”了煤矿的副产品煤矸石,水泥厂“吃掉”了发电厂的粉煤灰和 PVC 生产的工业废渣,水经过处理可以重复使用。循环一圈下来,“废”都变成宝,减排减到“零”。企业不但没有增加负担,还节省了项目投资,降低了生产成本,享受了税收优惠……一位老化工专家说得好:资源和污染是相对的。资源不能充分利用,排放出去就是污染;如果加以巧妙利用,常人眼中的废弃污染物也能变成宝贵资源。

看来,节能减排不能仅停留在治理的层面,还需要改变思路,千方百计提高资源利用率,从源头上减少污染排放。如在生产和服务过程中,尽可能地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物的产生;尽可能地延长产品的使用周期,防止产品过早地成为垃圾;最大限度地将废弃物转化为资源等。这样,节能减排就不再是“包袱”,而是可以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的财富。只有“包袱”变为财富,地方政府和企业才能将节能减排的压力化为动力,由“要我减排”变成“我要减排”。

80 亿欧元核电订单意味着什么

► 沈若愚

法国阿海珐集团日前在北京宣布,与中国广东核电集团签署了高达 80 亿欧元(约 870 亿元人民币)的协议。这是法国核工业有史以来获得的最大一笔订单,也是不到一年时间内,我国签订的第二张核电大订单。去年 12 月,美国能源部长鲍德曼访问中国之际,中国与美方签订了价值约 56 亿美元的核电引进合同。

这一系列订单,是我国核电中长期规划的产物。根据近日公布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到 2020 年,我国核电占全部电力装机容量的比重要从现在的不到 2%提高到 4%。为达到这一目标,我国目前已经规划 13 个核电项目,估计还可能再建数十个核电项目。其实与先进国家相比,我国核工业的应用规模小,总体水平并不高。数据显示,至 2006 年,全世界已经有 400 多座核电站,正在给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和火电价格不相上下的核电,年发电量占全世界总发电量的 17%。其中,法国核电装机占其总装机的 78%,日本为 36%,美国为 20%,韩国为 42%,而我国内地仅为 1.6%。

我国以前之所以发展核电的速度不快,除了考虑投资规模、原料供应以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担心安全问题。这样的考虑主要是因为目前全球正在运行的核电站,均采用核裂变发电方式,这种技术如运用不当会产生放射性污染。但为了可控的安全问题而放缓发展核电,就有点因噎废食。更何况,除了核裂变还有核聚变。近期我国加盟了国际核聚变实验堆(ITER)。一旦核聚变发电得以实现,其原料锂和氘在陆地和海洋中都极为丰富。据预测,ITER 可望在 2017 年左右投入运行。

当然,解决能源问题我们所依靠的远不止核能一项。9 月,我国公布了《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其中指出我国将发展水能、生物质能、风能和太阳能。将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定为,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占比从当下的 8%左右,提高到 2010 年的 10%,并在 2020 年进一步发展到 15%。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曾指出,历史的经验反复告诉我们,真正的长期的能源危机并不存在。当一种能源的价格上升时,消费者将被导向减少或停止消费,而供给者被导向更多地生产。如果该种价格被预期持续上升,其他可替代能源就会迅速地被开发。况且,现代人还会更多地考虑环境保护、安全和稳定性。

本版所刊文章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事件回放

为 2008 年我国经济谋篇定调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日前在北京闭幕。会议提出,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这意味着,“双防”将正式担纲明年调控主线。

与之相对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我国将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而这种政策搭配,在近年来尚属首次。

新闻时评

通胀如影随形 改善民生优先

► 李长安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之一。实际上,防止明显通胀不仅是保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从根本上来说,更是进一步改善民生工作的需要。

从历史上看,通胀几乎与市场经济的历史一样古老。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通胀如影随形,而恶性的通货膨胀多次对社会民生造成巨大灾难。因此,世界各国政府普遍把控制通胀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也经历了 3 次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分别发生在 1980 年、1988 年和 1994 年。同样,这 3 次通货膨胀均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大起大落,民生受到了直接冲击。

从本质上说,通胀就是物价总水平普遍而且持续地上涨。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通货膨胀的苗头已开始显现。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自今年 3 月份 CPI 首次突破 3%警戒线达到 3.3%以来,CPI 指数就一直维持在 3%以上,10 月份达到 6.5%的高点,与 8

月创出的 10 年最高点持平。因此可判断,明显通胀的阴影正在日益向我们逼近。

对于我国而言,持续的物价上涨至少会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改善民生造成负面影响:

首先,不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从这次物价上涨的情况来看,涉及老百姓基本生活需求的必需品如猪肉、食用油、柴油、液化气等是此次推动 CPI 不断上新台阶的主要动力。而生活必需品的物价上涨,无疑会对老百姓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支出形成挤压。

其次,不利于提高国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在收入分配中,提高居民收入占 GDP 的比重是改善民生的重要物质基础。长期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占 GDP 比重偏低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一个痼疾。以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为例,目前我国劳动工资只占 GDP 的 15%左右,不但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不少发展中国家。此外,通胀还能通过“强制储蓄效应”,把居民、企业持有的一部分收入转移到发行货币的政府部门,这无

疑会进一步削弱居民收入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最后,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通胀具有再分配国民收入的功能。对于收入水平不同的社会阶层,通胀的影响是不同的。一般来讲,依靠固定收入的人群在整体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例会变小,而这些固定收入者绝大部分都是普通工薪阶层员工、领取养老金的高退休人员,其中也包括不少低收入者,他们是通胀中的弱势群体,抗风险能力最差。相比之下,高收入者中不少人由于收入来源较多、资产分布较广,相应地抗通胀能力要强得多。

于是,通胀条件下社会容易放大“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还处在结构性

物价上涨阶段,尚未步入明显通胀区域。但在经济转向过热、流动性依然过剩的

背景下,出现明显通胀的可能性正在增大。如此,改善民生工作无疑将面临更大困难。因此,采取多种宏观调控措施,多

管齐下,努力将明显通胀抑制在苗头阶段,就自然而然地将成为当前和明年经

济工作的重点。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学家祝宝良

声 音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海鱼

协调各方面力量

平稳物价需要协调各方面的力量。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国内外协调、城乡协调的概念,表明明年围绕“控制通胀”需要财政对低收入者的财政转移、公共投入到位、货币供应量控制及资源性价格改革等方面的措施加以配合实施,才能有效。物价考量的是宏观调控的全局性与协调性。在此前提下,资源性价格改革需继续推进,只有还原资源性产品价格才能促使投资回落,进而形成经济良性增长。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

提升预见性和主动性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报告看,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预见性,二是主动性。目前物价水平仍比较高,很多措施从目前的角度看仍缺乏预见性。同时,主动性方面也要加强,目前的宏观调控如利率、汇率等,不能留于被动境地,需要先声而动。

2008 年宏观经济能否取得平稳发展,提升预见性和主动性是主要问题。目前经济有过热的危险,物价有上涨的危险,资产有泡沫的危险,面对现有的情况,只有从紧。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蔡志洲

抓好一紧一松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一紧一松。目前我国经济连续 5 年每年增长 10%以上,但是物价年均增幅只有 2.55%,而美国去年物价增幅是 6%。尽管近几个月我国物价短期内增幅超过 6%,但并没有出现恶性通胀,同时物价上涨对于农民是有益处的。原因是,经济高速增长周期前期的好处被有钱者占有,比如房价上涨。而目前农产品价格上涨作为经济高速增长后期的好处被农民占有,政府应该给以支持。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学家祝宝良

注重社会协调发展

稳健的财政政策,是指将以结构性调整为主,更加注重社会协调发展。国家在环保、教育、医疗、三农等方面的投资将进一步加大;而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意味着利率仍然存在上升空间,同时产业政策、土地政策、信贷政策等要实施组合,这对进一步防止经济过快增长转过热是必须的。但其中关键是货币投放,因为涉及到物价问题。

我国加息是否进入了疲劳期

►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彭兴韵

近期,市场一直在推測央行会在何时加息。当国家统计局公布 10 月份 6.5%的 CPI 数据后,又有人断言央行可能就要加息。然而,这些预言都落空了,从上次加息到现在为止,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尽管金融面的数据仍然热度不减,CPI 在经历 9 月份的回落后又回到了近 10 年来的

历史高位,但这次央行在市场不断揣测加息的喧嚣中,却显得格外镇定。中国加息似乎进入了疲劳期。

从调控的手段来讲,央行正在努力采取其他的政策手段来达到货币政策的目标。相对于过去单纯冲销流动性和提高利率稳定的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而言,现在央行被迫采用更多的手段来达到内外平衡的目的。在原有的汇率机制和汇率水平下,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只不过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个方面而已,因此,忽视外部失衡而追求内部平衡的努力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央行在第三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要加强汇率政策与利率政策的协调配合,这表明,央行行正在试图在通过外部平衡促进内部平衡。

近两个月来,人民币升值的步伐明显加快,至 11 月 23 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经突破了 7.4,年内累计升值幅度已经达到了 5.3%,这固然有美元汇率指数下跌的影响,但更可能是央行让汇率水平的变化担当了相当一部分宏观调控的重任。而且,相对于提高基准利率而言,用汇率水平的变化促进调控的影响是结构性的,而调整存款款的基

准利率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正是因为汇率在我国央行宏观调控中作用的加强,使得货币政策对利率的依赖性稍微有所放松。

中国目前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都是“有的放矢”。法定存款准备金被用来冲销流动性,并进而抑制商业银行的放贷能力;提高利率则主要用来“稳定人们的通胀预期”。在市场纷纷猜测央行加息时,央行却选择了“无为”的办法本身就表明了央行自身的一种态度。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参加 20 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期间表示,他对中国目前的利率水平感到满意。两个月以前,周小川还表明,希望中国的实际利率为正。因此,在当时物价指数“创出新高”的数据一出炉,央行便立即果断地采取了加息的举措。由此看来,上月央行没有如许多人预期的那样,可能反映了政策决策者对将来物价走势的一种判断。这大概是目前中国进入加息疲劳期的原因之一。

中国暂不加息的第二个原因可能是中国宏观经济正在发生某些微妙的变化。中国这一轮的高速经济增长明显受到城市化和居民消费需求结构升级的影响,但随之而来的资产价格大幅上升,使中国居民对以住房为代表的资产需求又受到了较大的抑制。再加上 2006 年以来央行连续多次提高利率的影响,中国居民资产需求的成本也较前两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在此情况下,中国居民的资产需求可能在逐步减弱。此外,现在的一年期的贷款基准利率已经

提高到了 7.29%,与企业总体的资产利润率大致相当,企业投资需求也已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另一方面,在高增长的过程中,中国国内需求并没有与经济增长率一样的速率上升,结果,中国高积累与高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就不得不依赖于强劲的出口需求。而美国次级抵押债务危机正在加深人们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担忧,这对中国的出口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利的影。近期一些基本投资品的价格大幅下挫,可能就是中国的投资需求正在减弱的表征。从这个角度来看,近期中国股票市场的调整,可能不过是它作为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开始正常地发挥作用罢了。倘若中国经济难以持续过去几年那样的强劲增长势头,那么,现在贸然提高利率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第三个方面的原因可能在于,央行货币政策目标的微妙变化。《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但前不久周小川则表示,人民银行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进一步加强和改善金融调控,货币政策要注意经济增长、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之间的协调,货币政策要坚持以人为本,在宏观调控和制定货币政策时就要考虑促进就业。多目标的货币政策体系,在面对目标的一个方面的冲击而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时,还不得不顾及其他。从理论上说,物价稳定与促进就业之间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矛盾。这意

味着,现阶段货币政策决策时依然会考虑物价稳定与就业之间的权衡。如果为稳定物价和通货膨胀预期而大幅度地提高利率,危及到了货币政策促进就业目标的实现,那么,利率政策就会受到相应的制约。

中国加息进入疲劳期的第四个因素在于国际环境。自 8 月份美国次级抵押债务危机引起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以来,包括花旗、瑞银等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国际大型金融机构在这场危机中所遭受的巨大损失逐渐浮出水面。面对相关机构裁员的增加、消费者信心的受挫和房屋价格的下跌,美联储改变了危机初期单纯向市场提供流动性的做法,而是采取了更加果断降息的策略。相比于欧洲而言,中国的利率政策所受到的牵制有过之而无不及。面对越来越多的全球资本纷纷涌向中国的局势,再加上人民币升值因素的影响,中国还要逆势而为,提高利率,无疑会使货币政策招致更多的麻烦。

总之,相对于今年早些时候的加息,现在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央行并没有因为“几个数据”依然偏高而如市场预期的那样立即提高存款款的基准利率,体现了央行在目前不确定加大的环境下货币政策决策的谨慎性,也反映了央行正试图通过加强利率与汇率机制的协调配合,完善我国的货币调控机制。这本身也是货币政策“稳中适度”调控思路的延续。至于未来利率政策的变化,应当依据宏观经济环境的进一步变化相机而定。